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

在坚持守正中不断创新

□阎晶明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周年，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历程，让人感受颇多，令人感慨万千。从延安到北京，从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党对文艺的领导、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理论引领和实践倡导，党的文艺理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是无比丰富的宝藏，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我个人的学习体会是，从延安《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既有一脉相承的理论坚持，又有着根据时代发展、社会变迁以及文艺实践需要应运而生的理论创新。这种坚持中的创新，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上的体现。

这里，我就“一脉相承中的理论创新”谈两点学习体会。

一是80年来党在文艺理论上的坚持与创新。80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文艺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上最闪亮的坐标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强调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是党对文艺提出的最高的也是最核心的要求。如果我们认真梳理会发现，在强调文艺与人民密不可分的关系时，党的领导人既始终坚持鲜明的立场，又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丰富，使之有一个不断丰富、不断提升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人民群众的生活对文艺的重要性。《讲话》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是客观的、第一性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向它学习的对象。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原料，是文艺工作者的唯一的源泉”。这就是告诉作家艺术家，要创作，不能呆在书斋里，不能躲在象牙塔里，要走出去到人民当中去，因为人民的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在今天看来，这个要求是一个基本要求。对于当时的文艺家们来说，他们怀揣着理想与热情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面对的是艰苦的生活条件，迎接的是残酷的战争环境，能否把个人的文艺理想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这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

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强调“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强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可以看到，这一论述中，在强调作家艺术家要到现实生活中获取题材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文艺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就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有了更高要求。“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更是一种鱼水关系。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出许多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这里强调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同人民发生紧密联系，要写他们，要让他们成为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思深入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同时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与毛泽东、邓小平对文艺和人民关系的论述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脉相承，同时又结合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提出了更高、更全面、更深刻的要求。从人民生活是一切文艺的唯一源泉，到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再到今天的“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这其中的理论升华清晰可辨。

二是8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论述中的坚持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及指示、批示、贺信、回信。这些重要论述，一方面是思想上具有统一性、贯穿性，在具体指向和任务要求上，又各有侧重。梳理起来，也可以说呈一种不断拓展、不断深化的递进关系，呈一种贯穿统一和递进深化的发展脉络。

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直指当前文艺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以及“浮躁”等一系列问题，在文艺界乃至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文艺界对这些问题和现象平时也有议论，但如此高度的概括，直指问题的要害，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探讨、寻找突破这些问题的路径。“高原”“高峰”一时成为文艺评论的新名词、新概念。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了文艺要讴歌英雄、崇尚经典。讲话指出，英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坐标，作家艺术家要想很好地反映一个时代，必须去讴歌英雄。经典的文艺作品为什么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这些论述，既在理论上作出坚定回答，同时也体现了总书记对当代作家艺术家创作精品力作寄予的殷切期望。

2019年3月4日，在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议的讲话中，对文学艺术界所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讲话充分肯定文艺界“为人民创作的导向更加解明”，以及“文艺创作生产质量不断提升”，同时强调要重点抓好出作品这个中心环节，没有作品，别的活动再花哨、再热闹也没有用。

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广大作家艺术家在文艺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进而对广大作家艺术家呼应时代召唤，围绕重大主题进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褒扬，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推出大量优秀作品，”我国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讲话既有对文艺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有对存在问题的深刻剖析。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清醒分析文艺思潮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清醒分析创作现状，通过推出大批精品力作、而现更多创作人才，回答和呼应新时代的要求和希望。要牢记重托，不负使命，通过创作、评论、翻译和文学组织工作，交出满意答卷。

『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潘凯雄

80年前的5月23日，是中国文艺值得铭记的一个重要历史时点，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岁月，党中央还是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全部三次会议，并留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献，由此亦可见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做好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讲话》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明确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的源泉、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等一系列重大根本问题，而且也对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思想性与艺术性、如何做好文艺批评等事关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讲话》的科学精神，对贯彻相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责任使命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在此，我仅就《讲话》中有关做好文艺批评工作这一具体问题，并结合工作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某些现象谈一点个人粗浅的学习体会。

《讲话》明确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段文字虽不足200字，却提出并回答了有关文艺批评三个十分重要的根本性问题：一是文艺批评工作的重要性；二是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三是文艺批评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我看来，在《讲话》发表80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整体上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距离毛泽东同志的要求依然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具体来说，关于文艺批评的重要性，虽然在理论上没人否定这一点，但在实际工作中，一定程度上的重创作轻批评，或形式上“重”视、实际落实却很“轻”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是曾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存有诸如经费不足、影响力较弱、市场偏军等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因素，但这些现象程度不同地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对文艺批评的专门研究，参差不齐的现象依然比较明显，系统性、关联性、统筹性不够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做理论研究的不注重对鲜活文艺现象的研究和对作品文本的细读，只是忙于闭门设计自己的话语、搭建自己的体系，做具体批评的又往往过于陷入单个具体作品的评价，视野格局时有见出狭小的局促。关于批评标准，在内容和形式两者偏于一端的现象更不少见。一方面，单纯重主题重题材，只要主题红题材重大便好便优，至于艺术上粗糙甚至明显的编造，基本上也都属于可容忍可忽略的范围，还美其名曰是看主流看大节；另一方面，一味重视所谓形式的创新与个性的张扬，满足于表层上的新奇怪，在鼓励创新的幌子下，内容的苍白、格调的平庸、格局的狭小都不重要。上述这些现象不仅在日常的批评实践中并不鲜见，就是在各级相关单位组织的各种文学评奖或作品推优活动中也时有出现，而后者因其戴上“奖”与“优”的“桂冠”，客观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或不良导向不仅更强而且更加不良。

有鉴于此，今天我们在一起重温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问题的重要论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性。对此，我们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学通学透，更应在实践中逐一梳理、捋清问题，明确方向，由易入难，有针对性地予以改进，要做到这一切，首先需要的是对文艺批评工作的高度重视与认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深刻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为此，我们仍需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讲话》精神的发扬光大

□胡 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同志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80年来，文艺界从未间断过对《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和贯彻。在文艺理论上，《讲话》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和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则是对这一命题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实践方面，已经形成新的创作热潮，并在决胜小康社会之际达于高潮。

研究这一高潮对于深入认识《讲话》精神，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脱贫攻坚之战，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千百年来迫求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国作家们没有缺席，在各地宣传部门和作协的组织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精准扶贫第一线体验生活、从事创作，投入作家的数量之众是前所未有的。一批又一批相关主题的作品不断问世，创作的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形成了全国各地攻坚战场都有作品反映，典型省份、重点地区、“最后一公里”地带都有作品描写的崭新局面，这一态势的形成，正是党工艺工作紧紧贴近人民群众的结果。

投入相关主题创作的著名作家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使整体主旋律创作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作家的创作是自由的，写什么、怎样写，由作家自己决定，但是有这么多重要作家能够积极投身于这项创作，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作家们普遍认为，小康建设事业意义重大，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很值得进行文学书写。毛泽东同志关于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生活的思想，在今天也得到大规模的实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作家是愿意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到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去亲身体验、获得灵感的，“深入生活”已化为作家们的自觉行动。

作家本来自人民。当家乡西海固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时，作家李栓梁十分激动，自2018年起由几子开车重走旧地，往返三四十趟自发采访，后写出《西海固笔记》。陈应松回到公安县，写出《天露湾》，满怀热情热颂扬了发展葡萄产业给老家带来的奇迹。王怀宇在《芬芳大地》里真挚书写留在乡村的老同学们，为他们命运的改变倾情抒怀。

作家们为深入生活不辞辛劳，徐剑曾20次入藏，《金青稞》描绘了西藏最后一批脱贫县奔小康的故事，他们为一个雪山环绕的莲花圣地的发现而欢呼。红日为创作《驻村笔记》主动申请到一线扶贫，并任偏远村驻村第一书记。有些作家带病坚持工作，有的在采访中疲劳过度，甚至离我们而去。

作家们的创作成果，使许多过去鲜为人知或人们不太熟悉的地区得到实际生动的展现，一些地方由此“一举成名”。王宏甲偶然发现贵州赫约村事迹，在无人邀请情况下主动写就《赫约道路》一书，出版后得到多方面的肯定并广受关注，此后全国各地到赫约村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使一个以“地理信息”产业闻名的县得以突出报告，书中呈现的乡村数字化程度令城镇工人惊叹。作家们书写了大乡镇县新状况，并非来自过去印象或想象，如温燕霞的《琵琶围》里，贫困户们都拥有手机，即时通讯，“钉子户”石浩财甚至熟稔于录像直播，在平台上拥有自己的粉丝，数次借此挑起事端，这些情节带来了作品别样的现实感。

当然，作家们更为大众读者介绍和集中刻画出许多时代人物。朱晓军《中国农民城》中的陈定模的形象几乎是惊人的，他开创了农民集资建城的道路，克服无数现实阻力，促使龙港市成为一座“现代农民城”。王华以在扶贫工作中牺牲的干部们为原型，写出了《大娄山》，颇为感人，其中碧痕村原第一书记娄委，从未出场却身影时时浮现，她的精神始终鼓舞着后人。滕贞甫《战国红》中塑造的“四大立棍”四个农民，由于直接出自生活，栩栩如生，使人印象深刻。

作家在深入生活中常有意外的发现，带来主题的丰富、视角的更替和题材的演化。关仁山听到一个农民挖掘老种子金谷的故事，形成《金谷银山》的雏形。王松深入基层，认识到农民们精神蜕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写们的要求。任林举详尽考察晋江的商业传统，使《晋江，奔流到海》富于文化内涵。陈毅达笔下的台风和大石厝，传达出《海边春秋》中独具特色的乡情。也有作家在接触地方革命传统时意识到脱贫大业密切关联革命初心，如吴克敌的《乾坤道》展现延安精神渗透新农村建设，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形成红色历史与小康征程的双重奏构，潘小平的《大别山上》写出一部跨越近百年的人民脱贫史。

这些创作实践，是《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扬光大；这些创作实绩，是作家们在新时代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结果。这些成就证了那些基本的文艺原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

□何向阳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重读《讲话》，感到虽然80年过去，但讲话思想仍然历久弥新。《讲话》分“引言”部分和“结论”部分。“引言”部分讲了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供大家讨论；“结论”部分讲“问题的中心”，即“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服务、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体工作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即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等等。《讲话》全文约两万字，中心思想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也就是讲话“结论”部分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为什么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提出的全部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展开并做答的。“人民”二字，就是从《讲话》开始，确立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上，成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指南。

重读《讲话》，我的最大感受或从中提炼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同于其他文艺的特征所在。

与人民结合，指的是作家在思想情感上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不熟”、“不懂”是不行的。“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引言”部分一开始，毛泽东同志次用到了“结合”这一词汇，“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他接着说，“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这里讲的，有文艺与时代的结合、与人民的结合、与革命工作的结合，而其之于文艺创作者的中心要领仍是要与人民结合。当然，这些话离不开当时的语境，但时隔80年之后，我们重温，仍然能够品出其中的分量。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的文艺创作者，我们的作家，能不能说就已经与人民结合了呢？我们能拍着胸脯说，我们已经全然克服了“不熟”“不懂”，而已然解决和完成了80年前《讲话》提出的问题和使命了吗？我不敢打保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时代命题与相关语境会发生变化，但是文艺必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仍然在那里，它仍然在向我们要一个答案。“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命题，就如作家要问他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样，这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一个写作命题，是文学工作者必须直面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80年前，毛泽东说，“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要求相矛盾的现象。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使一个以“地理信息”产业闻名的县得以突出报告，书中呈现的乡村数字化程度令城镇工人惊叹。作家们书写了大乡镇县新状况，并非来自过去印象或想象，如温燕霞的《琵琶围》里，贫困户们都拥有手机，即时通讯，“钉子户”石浩财甚至熟稔于录像直播，在平台上拥有自己的粉丝，数次借此挑起事端，这些情节带来了作品别样的现实感。

当然，作家们更为大众读者介绍和集中刻画出许多时代人物。朱晓军《中国农民城》中的陈定模的形象几乎是惊人的，他开创了农民集资建城的道路，克服无数现实阻力，促使龙港市成为一座“现代农民城”。王华以在扶贫工作中牺牲的干部们为原型，写出了《大娄山》，颇为感人，其中碧痕村原第一书记娄委，从未出场却身影时时浮现，她的精神始终鼓舞着后人。滕贞甫《战国红》中塑造的“四大立棍”四个农民，由于直接出自生活，栩栩如生，使人印象深刻。

作家在深入生活中常有意外的发现，带来主题的丰富、视角的更替和题材的演化。关仁山听到一个农民挖掘老种子金谷的故事，形成《金谷银山》的雏形。王松深入基层，认识到农民们精神蜕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写们的要求。任林举详尽考察晋江的商业传统，使《晋江，奔流到海》富于文化内涵。陈毅达笔下的台风和大石厝，传达出《海边春秋》中独具特色的乡情。也有作家在接触地方革命传统时意识到脱贫大业密切关联革命初心，如吴克敌的《乾坤道》展现延安精神渗透新农村建设，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形成红色历史与小康征程的双重奏构，潘小平的《大别山上》写出一部跨越近百年的人民脱贫史。

这些创作实践，是《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扬光大；这些创作实绩，是作家们在新时代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结果。这些成就证了那些基本的文艺原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立场、态度和文艺观

□刘 琼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三次与会，两次讲话。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发表。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由此，《讲话》成为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

《讲话》和上述这两个文件，是我们党领导和开展文艺工作的重要遵循。党内党外，特别是党内的文化界和知识界，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一是准确理解和把握《讲话》精神，获得关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文艺工作与其他革命工作的关系的正确认识；二是贯彻和落实《讲话》指出的道路和方向，获得开展文艺工作的正确的路径方式，获得立足国情、服务人民大众、建功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讲话》是毛泽东同志针对解放区文艺现状以及党内长期存在并产生争议的一些问题，有的放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科学论断，这其中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立场决定态度，站在谁的角度？为谁创作？宣扬谁？支持谁？“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划底地解决它”，文艺创作是精神活动，精神活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决定了文艺工作特别是文艺创作的历史方位和现实追求。如果站在人民大众的文学立场，谁是问题，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表扬谁，批判谁，一目了然。解决立场问题，就解决了认识问题，解决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其次才是解决如何为人民，如何实现大众化、普及和提高的问题。由此，《讲话》提出，知识分子要深入生活，和书写对象结合，解决文风、对象、素材等问题。

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从立场问题延伸、派生出一系列其他问题，立场问题如果不解决，其他问题即使解决，也是暂时的、意义不大的，最终还是要出问题的。解放区文艺是这样，社会主义文艺同样如此。这是每次学习《讲话》都会获得的深刻体会。

如何解决立场问题？从党内党外文艺工作者角度，《讲话》提出要主动改造世界观，坚持学习马列主义，要深入生活、学习新生活，同工农兵结合。从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发展角度，《讲话》明确提出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文艺工作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指出：“在我们内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清晰地阐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解决了立场这个原则问题，也就解决了对于“文艺”属性的认识问题，解决了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

纲举目张，解决立场问题，才有可能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当时也是当前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挥取最能代表中国空间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写新篇章。”文艺应该追求什么？文艺应该表现什么？《讲话》阐明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学艺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革命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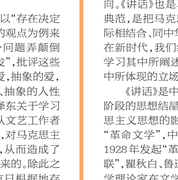
80年来，从解放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到社会主义文艺为团结鼓劲、砥砺干劲、凝聚人心，为道共识、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发挥重要作用，党内党外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作出一大批思想内涵深刻、思想认识深刻、富有创造力和感染力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也是《讲话》提出的精神、时代要化、环境变化，社会生活变化，文艺工作要不要表现新时代、新形势、新生活？如何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趋势？看起来是态度问题，其实是文艺观问题。一切富有责任和使命意识的文艺工作者无法作壁上观，也不能经济于时代生活。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增强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自觉把握时代需求、顺应时代潮流，真实书写时代史诗，生动表现时代华章，服务大局和中心工作，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也满足时代对文艺工作的新要求。

《讲话》通篇风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芒，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学习《讲话》，同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结合学习中国国情，有助于推动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正迎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关头，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动摇，至关重要。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丁国旗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所讲到的五个方面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80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一问题，对于更好地继承《讲话》的理论遗产，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讲话》中，毛泽东根据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总结出了延安时期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是《讲话》“结论”部分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又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为”的前提，还是解决延安文艺和各根据地文艺存在的其他所有问题的前提。所以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非常重要，“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然而，毛泽东却得出了“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这一结论，因为：“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的现象。”这就是毛泽东得出“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的证据所在。显然，理论上的认识有了，实践上不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还是没有解决。

无产阶级的文艺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毛泽东解明地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为“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的观点，大家也是认可的。然而，理论上的认识，最终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在毛泽东看来，“在理论上”或“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但‘在实际上、在行动上’这种轻视工农兵的现象却是实际存在的，不站在工农兵群众立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能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所在。

“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这些情况都是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已经存在和表现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充分说明：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是着在实际上、行动上还是着在理论上、口头上，是不是走出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工农兵群众心连心、心贴心，是不是真的爱工农兵群众等，这些都是判定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否真正做好或得以解决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不是说在理论上、口头上解决了，在实际上、行动上也就解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具体落实于现实之中，那么即使有再高深的理论上的认识也是毫无意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毛泽东提出要做到两个“深入”和两个“学习”，具体来说就是，“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来解决。

其实对于从上海“亭子间”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人而言，要切实做到两个“深入”其实绝非易事。所谓“深入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主动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研究他们、描写他们，和他们做知心朋友，从而实现对他们的描写，从衣服到面孔也都成为他们的样子；爱他们的感情，也爱他们的姿态，做到和他们情感相通，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看待生活。所谓“深入实际斗争”，实际上指的就是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走进实践第一线，与工农兵群众一起并肩战斗，一起锻炼成长，使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得到锤炼和提升，从鲜活实践中获取生活素材与第一手材料，在创作中书写工农兵群众的情感，抒发他们的心声。两个“深入”主要解决的就是文艺工作者对于“工农兵群众”和“实际斗争”不熟、不懂的问题，即“人不熟”“语言不懂”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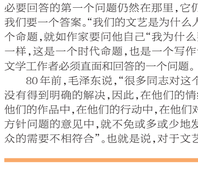
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以“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为例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批评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多的是从文艺工作者“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熟悉、不了解，从而造成了在理论上颠倒是非等现象提出来的。除此之外，学习马克思主义，还与各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各种文艺观点芜杂混乱，特别是一些错误观点的盛行，对抗战宣传已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事实直接相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无疑对肃清一些文艺观点的错谬之处，制止各种翻涂观念，达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总之，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这一观点，对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而言是非常及时和切中要害的。鲁迅先生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掌握，怎么可能写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爱工农兵群众喜欢的文艺；理论不被文艺家们掌握，又如何肃清各种错误的观念，激发出强大的“为人民大众”写作的动力，更好地提高服务工农兵群众的能力。

关于“学习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要说的实际上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的问题，因为“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学习社会”，简单来说，就是研究社会的问题，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悟，转化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认知，从而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毛泽东这里所谈的“两个学习”，具体来说，就是理论学习和理论运用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工作者在思想认知和文艺观念上的一切错误倾向、糊涂认识，切实实际文艺工作者的无产阶级立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两个“学习”的观点，对于我们处理当下文艺工作者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学习也有极强的启示作用。

总之，在延安时期，“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最终仍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今天亦是如此，只有回到实践，“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那就让我们来接受实践的证明和检验。

在新时代学习和继承《讲话》精神

□李云雷



2022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80年来，《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人民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讲话》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新时代，我们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既要学习其中所阐述的文艺根本原理，也要学习其中所体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讲话》是中国左翼文艺思想在进入历史新阶段的思想结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冲击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国的左翼文艺思潮迅速崛起，1928年发起“革命文学”论争，1930年成立“左联”，瞿秋白、鲁迅、胡风、周扬、冯雪峰等左翼文学理论家在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等问题上不断进行深入的讨论。1930年代也是一个“红色的30年代”，欧美各国的文艺思潮也都趋向左翼，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但是伴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都遭到了挫折与失败，而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在转入苏区特别是在进入延安之后，却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与深入。正因为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是胜利的，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经验，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也会遇到新的命题，而《讲话》正是在中国左翼文艺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环境中，在1930年代左翼文艺思想讨论的基础上，针对革命文艺的新经验、新问题、新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并作出了系统性的总结。比如“文艺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的问题，比如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命题，却是只有在共产党执政的解放区才有可能提出来并进行实践的。

《讲话》奠定了解放区和新中国前30年文艺发展的思想基础。1942年，《讲话》发表后，在晋察冀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在延安出现了《白毛女》，很多作家、诗人纷纷走向战场，走向工厂，走向田地头，在与时代、生活和人民的结合中创作出了不少经典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讲话》成为全国文艺界的指导思想，广大文艺工作者热情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创作出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柳青扎根皇甫村14年创作出《创业史》，周立波返回湖南益阳故乡10年创作出《山乡巨变》，至今仍是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

新时期以来，我们觉继续坚持《讲话》所开辟的文艺道路与方向，但